

馆藏文物定级

抗战文物定级实践探索

王乐斌
王卫丹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也为山东大地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抗战文物资源。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8月,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对省内20余家文物收藏单位的抗战文物进行了集中评估定级,共确认抗战文物100余件(套)。本文将以本次抗战文物定级实践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为抗战文物定级工作提供参考,为后续抗战文物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等工作打好基础,让山东丰富的抗战文物资源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价值。

什么是抗战文物?

抗战文物,是指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相关,能够反映抗战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遗存。抗战文物的时间范围应覆盖1931年至1945年十四年抗日战争时期,涵盖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全面抗战等阶段,确保历史脉络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在文物征集实践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进一步拓展了抗战文物的时间范围,将1874年以来日本侵略和占领台湾的各类文物纳入其中;同时涵盖战后战犯审判与返还相关的文献实物、战后中日关系史上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遗存资料,以及纪念抗战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名人名家创作的相关艺术作品,还有反映抗战历史的各类影像图片等。

本次评估定级所涉抗战文物,以1937年到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的实物为主,另有少数纪念抗战活动的纪念章、纪念碑设计稿、烈士名册等物品。

山东省抗战文物的特征与现状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山东先后创建冀鲁边、鲁西北、胶东等抗日游击根据地,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缴获枪械21万余支、炮900多门及大量军用物资,在民主法治、统一战线等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和教育意义的物质遗存。

结合山东抗战的历史脉络,山东抗战文物具备以下特征:

武器装备具有自主创造性。为适应山东地形与斗争方式,山东军民创造性地采用地雷战、地道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模式,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山东特色的抗战遗存。例如海阳市博物馆藏的铁雷、石雷等,是研究山东抗日根据地军工体系的重要资料。

承载“自主建武装、建政权”的初创期历史记忆。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在全国前列,文物见证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例如,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馆藏的理琪撰写的《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是胶东党组织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还原了抗战初期胶东地区建设与斗争的艰辛历史。

展现“全民参与”的革命精神。山东抗战文物留存鲜明的群众印记,是“军民一体”精神的物质载体。例如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由时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马保三托付“沂蒙母亲”王换于珍藏,后由其捐献,曾躲过日军多次盘查,不仅见证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更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在定级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现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抗战文物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而且由于抗战时期形势复杂,条件各异,某些文物在形制、工艺上差异较大,难以总结演变脉络;相较于历史文物多有明确来源,抗战文物来源较为复杂,在征集、拨交、交换和捐赠获取过程中,文物流转过程与历史背景追溯难度大,信息多依赖于口述或者文献记载,鉴定难度高;革命先烈的日常用品,使用痕迹显著,入藏之前保存环境不甚理想,致使文物普遍存在破损、腐朽、锈蚀等问题。

抗战文物定级的标准实践与难点考量

国家标准与山东实践

我国可移动文物定级主要依据《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该标准根据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将文物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一般文物四个等级。200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进一步明确近现代文物的定义和定级标准。2023年,山东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制定并下发《山东省革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重点阐释各个门类一级革命文物的定级标准。抗战文物定级实践中,通常综合参考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

结合本省抗战文物的区域特征,我们在定级实践中摸索了一些适合本省的方法:

侧重历史价值权重:与革命事件及人物存在明确关联的文物,予以侧重或优先考虑。若文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关键历史人物直接相关,即使其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并不突出,凭借其独特的历史见证意义,仍可能获评珍贵革命文物。例如“黎玉捐赠的抗战时期军装上衣”,黎玉曾长期担任山东地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为保卫和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巨大贡献,此件衣服承载着光荣的革命记忆和重要的历史价值,拟定为二级革命文物。

探索文物“合并定级”模式:对于关联性密切的文物,“合并定级”往往可以更深刻地发掘文物价值、展现人物的成长历程,或者更全面地反映事件的全貌。例如同一所有者的一批奖章,单独评估时价值有限,而作为整体合并定级,则可以生动反映某个人物或团体的发展轨迹,并“以小见大”,从一个角度反映大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又如肥城市档案馆收藏的“泰山情报站”开展工作所用的工具,是该情报站以“自行车局”为伪装时所用的修车工具。初为零星单件报送,专家研讨后认定其关联性强,成套合并后拟定为三级革命文物。

挖掘地域特色藏品价值:定级中重点挖掘山东省革命活动及相关人物的独特历史价值。如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征集的鲁西银行第五印刷所伍角纸币,鲁西银行是1940年1月中共鲁西区党委在东平县创建的抗日根据地银行,于1945年1月并入冀南银行,鲁西币流通时间较短,反映了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此类文物定级时需置于山东革命史宏观背景综合考量,使其融入山东革命历史整体脉络。

定级工作的难点

文物本身的真实性。文物真实性判定是文物定级的前提。抗战文物来源过于复杂,收藏单位在征集阶段过度关注其“革命”属性,易忽视文物的真实性,导致定级环节某些文物出现真伪争议。主要原因有:一是器物确为抗战时期遗存,但历经后期修复、改制或拼接,其原始形态与历史信息已发生改变;二是现代仿制器物在市场流通中大行其道,增加了真伪辨识的难度,其中尤以证章类、军刀类为多。因此,需先对文物年代、材质、工艺及历史进行全面考证,确保其真实性,方可启动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的复杂性。抗战文物中革命先烈的遗物占比高,其定级需参考多重依据:是否为本人实际使用、与革命事迹关联的紧密程度、流转过程是否清晰。定级时,对来源不明的文物需保持审慎的态度,既不能轻易忽略,也不能偏听偏信。必须核实文物的原始记录,尽可能找到相关当事人或其直系亲属辨识,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开展研究,避免因“信息不全”而低估价值,或因“信息误导”而拔高价值。

不同类型文物的侧重点不同。不同类型抗战文物的定级标准侧重点存在差异。其中,文献类文物,侧重“原始性”和“唯一性”。“原始性”指历史事件发生时直接形成,未经后期修改的文字记录,如革命领袖的手稿,承载着当时的思考过程,是最直接的历史见证。“唯一性”则体现在文献的稀缺性,尤其是经历战争完整保存的文献,对还原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物类文物则需重点考量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性”,若曾被名人烈士使用,或与特定革命事件相关,便不再是普通物件,而是历史事件的物质载体,其使用痕迹能反映革命记忆,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

结语

通过抗战文物定级活动,对文物价值进行认定,并进一步深入挖掘文物的精神内涵,对于优化保护资源配置、夯实展示利用基础、推动革命文化传承具有深远意义。

定级不仅是研究、保护与利用的起点,更是后续工作的基础与重要依据。通过明确价值、分级保护,让每件文物的价值被深度挖掘和展示,最终实现让抗战文物活起来、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目标。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定级标准需要持续优化,从而为新时代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本文为2025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入库在研课题“文物价值发掘与活化利用研究——以山东馆藏文物评估定级为例”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

博物馆里读中国

“瑞兽祥禽映华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世界”展览探赜

李其仁



图1 青玉蝉琀



图2 铜鱼杖头饰



图3 鎏金蛇头铜剑柄

在星辰与大地尚未被现代科学精确描摹的时代,在中国古人的内心世界中,万物共生、和谐交融。他们眼中的动物,不仅是自然中的生灵,更是文化、信仰与智慧的深邃象征。青铜器上庄严的兽面,玉器上灵动的龙凤,威严而神秘,承载着古人对力量的敬畏与想象;瓷器间细腻勾画的花鸟虫鱼,色彩斑斓、生机流转,透露出他们对自然之美的敏锐捕捉;陶泥巧妙塑成的家禽家畜,朴拙可爱,定格了日常生活的温暖。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古人理解动物世界的深刻印记,它们默然无声,却仿佛仍在低语那些关于生命、力量与美好的古老传说。2025年7月18日,由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主办,安徽博物院、福建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蚌埠市博物馆和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协办的“瑞兽祥禽映华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世界”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展。该展共展出233件(套)与动物元素相关文物,涵盖青铜、玉器、陶瓷、书画等多种门类。

展览以古籍《尔雅》中关于动物分类体系的虫、鱼、鸟、兽四大分类为依据(包含古人的“神奇动物”),共分为“霜草苍苍虫切切”“绕池闲步看鱼游”“春风和暖百鸟语”“百兽奔腾山林间”“神兽徜徉云间去”五个单元。设计上,展览巧妙运用中国传统书画卷轴的意象,将跨越漫长历史长河的珍贵文物融汇于长卷中,每一件带有动物形象的展品,都是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同时,利用“三绿”“白群”“花青”“芸黄”“绛紫”五个颜色对应五个单元的内容,颜色清淡悦目,给观众以视觉上的享受。

霜草苍苍虫切切

虫者,“六足四翼”“暑生寒死”“得阳而出,得阴而藏”。千姿百态的昆虫,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它们在草间生活,在花丛飞舞,在屋中鸣叫。古人在接触自然、认识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对千奇百怪、多种多样的昆虫有了深入的认识,同时与昆虫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青玉蝉琀(图1)

西汉

江西省博物馆藏

蝉形玉琀(也叫玉琀)在汉代葬俗中被赋予了非凡的寓意,与汉代人的生死观紧密相连。古人认为,生命的终结并不是真正的消失,而是灵魂的蜕变与重生。蝉的生命周期恰与这一观念相契合。

于是,人们便认为口含玉琀能够助力死者灵魂的蜕变与重生,进而升入仙界。

绕池闲步看鱼游

《尔雅》的《释鱼》篇前半部属鱼纲,后半部包括蛇、龟等爬行纲,还包括蚌、贝等软体动物。可见古人将主要在水中生活的低级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均归为“鱼”类,多为冷血动物。

铜鱼杖头饰(图2)

西汉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铜鱼杖头饰在李家山墓葬中多成对放置,鱼形一大一小,似分雌雄。雄鱼体态较小,身狭长,雌鱼体态较大,体宽肥,鱼口衔一蛇,鱼身布满半圆形鳞,扇形尾,背鳍、腹鳍清晰可辨,鱼腹中部下垂直接有两面浮雕同为正面的立体人像。这种鱼杖饰应是专用的礼仪器。

鎏金蛇头铜剑柄(图3)

西汉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蛇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多元的意义。蛇,乃龙之本相也。古人认为蛇的每一次蜕皮就是一次新生,经久不衰,永存于世,因此将蛇身赋予远古神祇,表明这些神灵永存世间,不死不灭。该件文物通体鎏金,茎铸成立体蛇头形,内空,蛇头作首,张口露齿,蛇颈弯曲,后接一字形格,背面有菱形鳞,腹面为横格鳞,属于模仿动物的某一部位制作的“仿生”兵器。

春风和暖百鸟语

两足而羽谓之禽。《尔雅》“释鸟”篇中的动物除蝙蝠、鼹鼠等飞行哺乳动物外,均为鸟类。我们的祖先在渔猎活动中逐渐认识了鸟类,拣食鸟蛋、食用鸟肉和利用它们的羽毛。到了新石器时代,现今所熟悉的家禽例如鸡、鸭和鹅等都已逐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被驯化成功,鸟与人类生活的关联愈发密切。由于擅长飞行的特殊能力,鸟也成为古人最重要的崇拜动物之一,并被赋予不同的“性格”,如鹰类象征勇猛,鹤类象征长寿,鸳鸯象征爱情的忠贞等。

(下转8版)

关于数字化陈列的几点思考

魏星

数字化陈列的实践现状与突出问题

实践现状:技术应用广泛,创新案例涌现

近年来,我国文博行业数字化陈列发展迅速,各级文博机构纷纷加大技术投入,推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化展览项目。从国家级博物馆到地方基层文博单位,数字化陈列已成为展览标配,技术应用涵盖VR/AR、全息投影、互动投影、大数据可视化等多个领域。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AR兵俑互动体验项目,让观众通过手机即可看到“复活”的兵马俑,了解其阵型与历史;河南博物院的“古乐复活”数字化项目,通过音频复原、互动演奏等形式,让观众感受古代乐器的魅力。同时,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发展,短视频、直播、数字文创等成为数字化陈列的延伸形式,进一步丰富了传播渠道与内容形态。

突出问题:表象繁荣背后的深层困境

技术与内容脱节,“重技术、轻文化”现象突出。部分数字化陈列过度追求技术炫酷,将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作为“噱头”,忽视了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呈现。例如,一些展览仅简单将文物影像转化为虚拟场景,缺乏对历史背景、文化价值的深度解读;部分互动装置设计流于形式,与展览主题关联度不高,难以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这种“技术堆砌”式的陈列,不仅无法传递文化核心价值,反而可能让观众陷入“技术疲劳”,影响展览效果。

体验设计同质化,缺乏个性化与创新性。当前,数字化陈列的体验形式多集中于VR/AR互动、全息投影展示等,缺乏差异化与创新性。多数展览的互动设计大同小异,如扫码看介绍、虚拟拍照、简单游戏等,难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同时,部分展览忽视了受众的差异性,缺乏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适配设计,导致体验门槛较高,影响了展览的普惠性。

数字化陈列的优化路径与发展建议

坚持“内容为王”,深化文化内涵挖掘

数字化陈列的核心是文化传播,技术只是手段。文博机构应始终坚持“内容为王”的理念,将文化内涵挖掘放在首位。一是深入研究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艺术价值、科技成就,提炼核心文化元素,将其融入陈列设计的各个环节;二是结合观众需求与时代特征,创新内容呈现方式,如通过叙事化设计将文物串联成历史脉络,让观众在体验中感受文化魅力;三是加强学术研究与陈列的结合,将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展览内容,提升展览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例如,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陈列不仅呈现了壁画的艺术之美,还通过数字技术解读了壁画的制作工艺、颜料成分等专业知识,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获得深度认知。

聚焦“体验至上”,打造个性化与普惠性陈列

数字化陈列的核心目标是让观众更好地感受

文化魅力,应聚焦“体验至上”,打造个性化、普惠性的展览。一是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设计差异化的体验内容。例如,为青少年设计互动游戏、科普动画等趣味性强的内容;为老年人简化操作流程,提供线下辅助体验;为专业研究者提供高精度数字资源、学术解读等深度内容。二是创新体验形式,突破传统互动模式,打造沉浸式、参与式的体验场景。例如,利用AI技术实现观众与文物的智能对话,根据观众兴趣推送个性化内容;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博物馆,让观众自由探索、自主学习。三是降低体验门槛,优化操作流程,确保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水平的观众都能便捷参与,提升展览的普惠性。

推进“标准引领”,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与共享

数字资源是数字化陈列的基础,应加快推进数字资源建设的标准化与共享化。一是制定统一的数字资源采集、存储、管理标准,规范采集设备、数据格式、元数据规范等,确保数字资源的兼容性与可复用性;二是加大数字资源建设投入,鼓励基层文博单位开展文物数字化采集工作,扩大数字资源总量;三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文物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打破机构壁垒,实现资源互联互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加强数字资源的更新与维护,及时补充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文物保护信息,确保数字资源内容的时效性。

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安全与发展并重

数字化陈列的发展必须坚守安全底线,实现安全与发展并重。一是加强数字资源安全防护,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用加密存储、访问控制、备份恢复等技术手段,防范数据泄露、篡改、丢失等风险;二是规范技术应用,避免技术滥用对文物造成伤害,在陈列设计中充分考虑文物保护要求,选用无损伤、低风险的技术设备与展示方式。

结语

数字化陈列是新时代文博行业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发展既需要技术创新的赋能,更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既需要满足公众的体验需求,更需要坚守文物保护的底线。未来,文博机构应始终坚持“技术赋能、内容为王、体验至上、安全可控”的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数字化陈列的质量与水平。

“十五五”时期,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与政策支持的不断加强,数字化陈列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数字化陈列将实现从“技术展示”向“文化传播”的深度转型,让更多文物“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